

低生育理性预期理论及其政策意义

胡伟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作者在分析了国内外低生育理论和预期理论之后, 提出了低生育理性预期理论, 认为它能够和人口学理论的主流相结合, 解释我国的低生育状况的原因。我国人口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 都要重视这个理论。

关键词: 低生育; 低生育理性预期; 人口政策的完善。

中图分类号: C9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5)02-0015-04

Rational Expectation Theory of Low Fertility and its Policy Meaning

HU Wei-lu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rational expectation theory of low fertility after analyzing the theories of low fertility and rational expectation, and holds that the theory can be combined with main stream of population theories, and then by the new one the cause of low fertility situation may be explained in China. The theory is important for improvement of our country's populatio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population strategy.

Keywords: Low reproductive; Low reproductive rational expectation; Improvement of population policy

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相继进入低生育阶段, 过去, 一般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工业化造成的结果。很长时间, 并没有见到完整的低生育理论。有的理论多半是从控制生育的角度来分析的。真正的低生育理论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中国最近二三十年完成了向低生育水平的转变, 有望在未来解决人口众多的问题。在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 形成和保持低生育的理论是什么? 这是应当回答的问题。

一、外国低生育理论

首先来说说外国最近提出的一些低生育理

论。

1. 合理选择理论

合理选择是建立在成本和收益对比的基础上的^[1]。生育孩子的成本可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生育孩子的实际的货币支出。间接成本是生育和养育孩子期间失去的收入。而生育孩子的利益, 最初往往是一个心理学的范畴, 也就是心理上的满足。生育孩子的实际收益往往只是一个开始, 也就是未来才有收益。

从生育孩子的具体收益来看, 西方社会认为生第一个孩子的收益有: 父母地位的确立,

收稿日期: 2004-09-20

作者简介: 胡伟略(1937-), 男, 湖北省黄冈人, 1960年北京大學經濟學系畢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研究方向為人口經濟學。

家庭的完全存在，家庭欢乐和爱的增进，给父母带来充满童年梦想的回忆，对孩子的哺养会带给父母各种喜悦。要第二个孩子的决定会涉及更多的关系，一个孩子的存在引起对另一个性别孩子的欲望。要第三个孩子、第四个孩子可能简单地表现为喜爱孩子。这些收益多为心理收益，而且是不断下降的。西方国家没有把生育孩子作为父母养老的收益来对待。同时也不把生育孩子作为家庭劳动力从而增加家庭收入来考虑。

关于孩子的成本，从家庭支出成本来讲，在西方国家是下降的。这是由于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以后，生育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经济的发达，生产的食物和服务成本下降。西方国家社会保险与福利制度的完善，税收和财政的转移支付体系，低生育的福利优先权的确立，生育保险基金的储备，孩子照料费的补贴（如瑞典的生育保险和福利中还包括父母因生育孩子的附加价值），还有一些免费服务，这些都减少家庭用于生育的支出成本。即使如此，西方国家的家庭仍然认为生育成本大于生育收益，从而实现持久低生育。

2. 风险回避理论 [RISK AVERSION THEORY]

合理选择还包括对风险问题的决策。风险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生育孩子在经济、社会、家庭、个人将来的认知是不可靠的。决策者可能会弄错，因此需要在安全方面避开风险。

在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中，人们的职业存在着高潮和低谷，不可能从事长久的终身职业。也就是说存在失业风险。人口流动需要准备很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就业机会是有变动的。利率变动，住房价格波动，影响人们生活。低收入，非自愿失业，消费品价格上涨，依赖人口的经济负担，等等，都会增大风险程度。生育孩子的风险使父母忧虑增加，风险使生育孩子的家庭支出扩大。风险不只是影响生育，甚至影响婚姻。日本、意大利等国不少青年认为，结婚会造成他们未来就业的风险。经济风险会造成一个低结婚率。一般认为，社会保险是对付各种风险的习惯做法。

3.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 [POST-MATERIALIST VALUES THEORY]

后物质主义是与第二次人口转变相联系的。这种理论推动社会和人口行为的再次转变。它驱使个人价值的增长，个人偏好满足的增长。人们的价值追求从传统势力中解放出来，追求更多的自由。随之，人们就可能从现代发达社会的物质主义中解放出来，与此相联的是离婚、同居和非婚生育等的增长。从而，形成低生育。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支持低生育，西方学者认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生态悖论”。意思是从现代社会里普遍情况来看，妇女受教育程度高，城市化水平高，宗教迷信少，态度和价值观更加自由，生育水平就低；相反，妇女受教育少，农村人口多，宗教迷信多，人们态度和价值观多保守，生育水平就高。

4. 性别平等理论 [GENDER EQUITY THEORY]

当代发达国家生育率很低，这是由于性别平等理论的推动^[3]。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中性别平等的程度不同。主张性别平等很强烈的地方和国家，生育率水平总是很低。如果妇女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和男人相等，这就会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要孩子的性别偏好期望。西方学者认为，性别平等分两方面：家庭制度内的性别平等和社会制度内的性别平等，两者是相关联的。社会制度的性别平等主要是受教育和市场就业机会的性别平等。家庭制度的性别平等主要是妇女权力尤其生育决策上的平等。只有社会制度的性别平等与家庭制度的性别平等相结合的运动方能形成低生育。

二、中国低生育理性预期理论

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行列，现在已稳定低生育水平多年。我国低生育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仅从经济发展和政策强制上解释是不够的。从社会、家庭的生育行为与心理上看，中国已形成了初步的低生育理性预期。

凯恩斯把预期分析作为重要的经济分析工具。他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心理预期状态总称之为长期预期状态，以别于短期预期”。“故

长期预期状态。那我们据之作决策者，不仅需看何种预测之或然性最大，亦须看我们作此预测之信心如何”^[3]。1961 年美国经济学家穆思（J. F. MUTH）提出了“理性预期”、“合理预期”的假说。上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R. E. LUCAS）等人对理性预期作了系统的理论创新，形成了科学的理性预期分析理论与方法^[4]。卢卡斯 1995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人口再生产可以作为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相联系的另一种社会再生产。由此，笔者 1996 年提出了生育的理性预期观点。

理性预期或合理预期是指人们能够根据大量信息，经过认真的处理和理智的分析，可以作出符合未来形势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期，从而作出较为实际和科学的决策。中国的生育，经过漫长的岁月和最近 30 多年的有意识的摸索，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盲目生育预期、较长的适应生育预期，形成了最近的理性生育预期，也就是低生育理性预期。

卢卡斯在运用理性预期理论和方法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时，提出了“自然率”假定。自然率可以是自然产量、自然增长率、自然失业率等。实际产量、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的变动是围绕它们的自然率（或产量）波动的。人口再生产当然也有“自然生育率”，但实际的生育率不应当围绕自然生育率波动，因为自然生育率有脱离经济社会等的限制而呈高生育状态。在发展阶段的中国，由于经济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存在一个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均衡生育率”。由于宏观经济发展需求的制约，中国的均衡生育率已逼近最低限。由此，使得我们提出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虽然农村及其他特殊困难情况可以生二胎，但仍然是最低的低生育了。

对低生育的理性预期，我国先是从政府、国家、社会的角度开始的，逐渐向家庭、个人发展，形成生育的社会认同与家庭理性决策的结合。就青年男女而言，虽然后物质主义还没有多少表现，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却有了很大影响，向往富足的生活，追求时尚的消费，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多数育龄人口已形成低生育理性预期。就业的艰难，失业的风险，生养

孩子巨大投入，一个孩子都应付不了，岂能多生？

性别平等在中国已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上却又表现得很不令人满意。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提倡生一孩。但是在大多数育龄夫妻选择或必须选择生一孩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而不是偏高，却是应当研究的。依我之见，从生育政策决策的角度上，不仅应当包括生育数量，而且应当包括性别比的调节。要在这两方面都能结合的很好，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但在生育上还是要大力提倡性别平等。

不管怎样，低生育理性预期理论和方法将会对我国人口学和人口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理性预期理论和方法的学派形成之后，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曾经评论，它在三个主要方面改变了经济学前景。（1）它阐明了预期在经济模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2）它提出了在技术上把预期加入到模型中的更好方程，传统的回顾式的预测方程不再受到欢迎；（3）它改善了政府制定政策的路线，减少政府决策的多变性^[5]。发展低生育理性预期理论与方法同样可以在许多主要方面改变人口科学和人口政策的发展前景。首先可以更好地运用人口统计资料，增强人口数据开发的目的和前景。第二，把理性预期放到人口预测和人口模型当中，丰富科学的预测方程。第三是根据预期研究的成果，完善现有人口政策，人口政策不能多变，又不能说永远不变。总之，政府由此懂得他们的政策要取得群众的信任。萨缪尔森认为，理性预期是一次革命，它可能导致新见解与过去主流经济学久经考验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如果低生育理性预期能够与人口学主流部分结合在一起，也可能引起一次变革。

由于理性预期理论是以完全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社会的发展已经高度的科学化、民主化、信息化，这样的条件在我国还正在建设之中，非理性的预期还不少。目前，低生育理性预期还是初步的。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完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形成，理性预期在我国就将进一步发展。

从地区来看，在城市居民中低生育理性预

期比较自觉一些，而在农村及经济落后的地方则难以完全做到。在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和家庭中能够自觉做到，在文盲半文盲及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家庭中还不可能完全做到真正的低生育理性预期。

从城市化来看，虽然最近时期我国城市化进程大为加快，但从全国来看农民还占很大比重。目前，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很多，尤其是土地、资源、能源的约束很大，环境污染、气候不好以及交通、犯罪等问题。城市化是否都让农民进城？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即第一次城市化基本完成时，应当有第二次城市化，城市化向小城市、小城镇发展，使知识化、信息化走向全国农村，那时候，全国居民和家庭的低生育理性预期又将大大提高。

从性别平等来看，当然是妇女多就业有利于真正的性别平等，有利于妇女的低生育理性决策。但中国人口、劳动力太多，经济结构正在调整升级，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加强，就业岗位增加受到挑战，还有不少妇女下岗失业，这虽然可以增加生育忧虑，但并未从根本上树立低生育理性预期。事实证明，有的家庭和个人一旦收入增多，有的人还想多生育。低生育理性预期对有些家庭还没有扎根。

但不管怎样，在生育问题上人们最终会从盲目的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的理性王国。我还以为，低生育理性预期理论是普遍性的，西方国家的低生育理论有很多，但中心的理论观点也还是人们对低生育的理性的合理选择。不过在吸收西方国家这些理论时，要去掉不科学不正确的部分，比如某些价值观问题、个性过度解放问题等，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中国低生育理性预期理论与外国低生育理论的科学部分结合起来，一定能形成系统的低生育理论。

三、低生育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意义

中国人口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相适应。这一政策是从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社会、自然环境极不

协调考虑而制定的。由于人口政策的正确并取得了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明显效果，所以使我国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代。虽然原来人口数量增长过快等人口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原有的人口问题有些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且还出现一些新的人口问题，如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老龄化加速、农村人口问题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紧张等。这就要求除了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进程，以及节约资源和治理环境以外，还要考虑人口政策的内容应当更加丰富更有创新。低生育理性预期不仅是针对生育而言的，它还应当理性地预期并解决其他主要的人口问题。

首先，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当然是不能放松，这一政策也不能改变。但在执行过程有些具体规定上还是可以考虑更合情合理，比如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城镇居民有9种情况的可以申请生二孩，这比以前有所松动，也更加符合情理。全国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第二，应当把调节出生婴儿性别比纳入人口政策。有的学者提出：第一个统计学定律是男女出生比例的规律大约是13/12。也就是108.3‰^[6]，或者是108.3‰^[6]。大量统计资料表明男性死亡率大于女性，尤其是男性婴儿死亡率更高。那么，性别的平衡是如何维系的呢？我们当然不能象古代人那样靠神授法则。但如果规定在人口政策中有意识的想办法加以调节，办法总是会有。

第三，应当把积极应对老龄化纳入人口政策。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引起上下各界关注，未来老龄化社会应当怎样安排，确实事关重大。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出现人口老龄化，国际社会多次提出有关政策建议，先是健康老龄化，后来又提出积极老龄化。也有学者提出“成功老龄化”^[7]。主要内容是健康、参与和保障，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快，数量大，未富先老，人口政策应当尽早设计。

第四，流动人口应当有相应的政策指导。2020年以前我国都要很好解决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问题，流动人口将会（下转第6页）

念的转变和生育意愿的多样化（例如有些城市家庭还可能选择成为“丁克”家庭），以及城市人口易于管理的紧密居住方式和计划生育工作控制能力较强等，在这些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可以预期的是，一些城市家庭即使满足新政策条件，也不一定就会选择生育2孩。这就使得政策微调后计划生育工作压力不会很大，人口生育数量后果也较为容易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4）这项新政策所惠及的家庭群体，除了城市以外，还有少部分家庭分布在经济比较发达、户籍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长期生育水平超低的东部农村地区。这些地区一般是经济发展基础较好，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较早较好，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发生较大转变，计划生育工作资金、队伍保障能力比较雄厚，人口控制能力较强的地区。可以预见的是，新生育政策放宽的影响后果也会在适度和可控范围内。相反，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生育水平相对较高、人口数量控制任务仍旧很重的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来说，由于能满足新政策前提条件的家庭比例非常小，因此对于作为计划生育工作重点的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的影响不大，不会引起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动荡，这样既可以保持这些农村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稳定，又易使广大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干部理解接受政策微调，避免损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综上所述，采取“单独家庭生2胎”的政

策微调，符合“小步慢行、平稳过渡”原则，既能最大限度减少政策性非意愿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又能缓解城乡不合理的二元生育政策结构和东西部人口发展的不平衡；既符合新时期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又符合公共政策“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既满足中央提出的今后一个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要求，又易于为广大群众和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接受；既有利于生育政策的平稳过渡，又在操作上简便易行。因此，在未来的10~15年间，普遍实行“单独家庭可以生育2胎”政策，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是一种比较合适的过渡性生育政策微调方案。

参考文献：

- [1] [日] 占部都美. 现代管理论. 新华出版社, 1984
- [2] 周长洪. 论计划生育管理决策的几个问题. 人口研究, 1999, (4).
- [3] 郭志刚, 张二力, 顾宝昌.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人口研究, 2003, (5).
- [4] 王秀银, 李兰永. 应从多角度审视成年独生子女意外伤害问题. 人口研究, 2004, (1).
- [5] 穆光宗.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 人口研究, 2004, (1).
- [6] 周长洪. 计划生育“三结合”利益导向机制的适应性基础. 人口研究, 1998, (3).
- [7] Robert D. Retherford, Minja Kim Cho, Chen Jiajian, 李希如, 崔红艳.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人口研究, 2004, (4).

[责任编辑 王树新]

（上接第18页）

长期居高不下，这会涉及城市化、现代化诸多问题，但从人口政策角度还是有很多政策问题应当加以规定的。

其他象农村人口、贫困人口问题等，我们都应理性地加以分析，并预期未来发展，然后科学地加以政策规定。总之，低生育时期的人口政策应当更加全面更加科学，更能调节人口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加里·S·贝克尔. 家庭经济分析. 彭松建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
- [2] 索维. 人口通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 [3]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
- [4] 布赖恩·坎特. 合理预期理论与经济思想.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七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 [6] 哈金. 驯服偶然.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 [5] 胡代光选集.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6
- [7] 胡伟略. 人口社会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王树新]